

# 晚清沿海的新貨幣及其影響

郝 延 平

- 一 引 言
- 二 銀鑄幣的使用
- 三 錢莊與銀行的貨幣
- 四 鴉片的貨幣功能
- 五 結 語

## 一 引 言

隨着晚清中西接觸的頻繁和商業的擴展，中國固有的紋銀和制錢的貨幣制度乃逐漸不能適應此一新情勢。因為銅錢的個別價值既微不足道，而紋銀也不易於分割，於是二者在日常交易中的使用，自然不便。為因應此一局面，晚清沿海就興起了三種新的貨幣形式，而貨幣的使用量也逐漸地在增加。這個貨幣上的新情勢，和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這三種新的貨幣形式是什麼？數量有多少？對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影響又如何？

## 二 銀鑄幣的使用

第一種新貨幣的形式是銀鑄幣 (Silver Coins)，包括銀元和五角等的銀輔幣，其中以銀元最為重要。銀元雖早在十六世紀後半期就輸入中國，但是在清朝中葉以前，數量既少，流通範圍又窄，因而只扮演着次等的角色。當時大宗貿易仍以銀兩計算，而銀元的流通實賴於當日的銀兩與銀元的兌換率。但嚴格說來，銀元的功能不只限於輔幣，因為銀元之所以變為中國貨幣的一環，乃由於其較紋銀使用起來大為方便的關係。就此一意義而論，銀元不是紋銀的輔幣而是紋銀的潛在勁敵。有朝一日，銀元將與紋銀並駕齊驅地競爭，甚或有凌而上之的態勢。

十八世紀末期，西商輸入中國的銀元數量激增，尤以廣州地區為然。銀元在沿海一帶流通漸廣，寔假而為貨幣供應的重要一環。迨十九世紀，銀元廣為零售商所接受，甚至在不少地區竟成為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交易的主要媒介。以銀元為記算單位的區際 (interregional) 貿易，多在通商口岸付款。但是在內地採買制度 (upcountry purchase system) 之下，<sup>①</sup> 銀元也經常被運往內地以購絲茶；是以每屆絲季茶季，銀元在此等商埠輒有高貼水的情形出現<sup>②</sup>。在華南的某些城市裏，由於銀元大量在市面流通，有時竟至喧賓奪主，變為計算單位，而紋銀反而淪落為附庸的地位。

在晚清沿海流通的銀元有多種。大致說來，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以西班牙銀元 (Spanish Carolus dollar, 亦稱「本洋」) 為主，其後以墨西哥銀元 (Mexican dollar, 亦稱「鷹洋」，後訛為「英洋」) 為重要。西班牙於一五六五年征服菲律賓後，其銀元即由該處傳入廣東、福建一帶。西班牙銀元成色可靠，重量一致，使用方便，再加上首先輸入而數量也多，於是漸成為沿海一帶的本位鑄幣。其本位鑄幣的角色，在廣州維持到一八五三年，在上海持續到一八五七年。<sup>③</sup>

西班牙銀元初入中國之際，是以其含銀的成分與重量而流通於市面的。十八世紀末，其數量漸增，已在閩、粵沿海一帶廣為使用。<sup>④</sup> 十九世紀初，本洋不僅為廣州外貿界的主要貨幣，而且也在廣西、貴州、江蘇、浙江、直隸各省流通。<sup>⑤</sup> 三十年代時，本洋在國內貿易上的功能益見加強。鴉片戰後不久，其使用範圍更廣。沿海物品的標價，更經常以本洋為單位。<sup>⑥</sup> 英商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 檔案很清楚地顯示，在十九世紀的前半期，所有流通的銀元之中，以本洋用得最為普遍，而且也最受歡迎。<sup>⑦</sup> 美商瓊記洋行 (Augustine Heard & Co.) 行東

① 關於內地採買制度，請參閱拙著，Yen-p'ing Hao,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0), pp. 75-83.

② 「上海錢莊史料」(上海，一九六〇)，頁五五六。

③ Frank H. H.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 (Cambridge, Mass. 1965), pp. 83, 169. 「上海錢莊史料」，頁二三，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北平，一九六二)，頁二六九。關於白銀的早期輸入中國，請參閱全漢昇，「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九龍，一九六九年九月) 第二卷第一期。

④ 楊端六，頁二七三。巫寶三、馮澤、吳朝林合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資料選輯」(北平，一九五九)，頁三八。

⑤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臺中，民國四十九年增訂版)，頁一二二，一二八。King, p. 272.

⑥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Minutes of Evidence." Vol. 5, 1847, pp. 24-25.

⑦ 怡和洋行檔案 (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藏)，Joseph Jardine (Hong Kong) to Thomas Hunt (Whampoa), Apr. 17, 1853.

何德二世 (Augustine Heard, Jr.) 指出，謂本洋不但享譽滬上，而且在內地的生絲產地，也炙手可熱。<sup>⑧</sup> 在浙江一省，由於官方有時指定須用本洋來完稅，因此在財政方面本洋也開始佔有一席之地，氣勢更盛。<sup>⑨</sup> 在華外商有時雖以合作方式來爭取利潤，但彼此之間也往往有激烈的競爭。本洋既廣受中國商民歡迎，西商就爭相以支付本洋來贏取華商的好感，進而擴大貿易。怡和洋行上海行東伯希梧 (Alexander Perceval) 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設法自別處多運本洋，用以支付華商的茶價絲價。即使如此，他在一八五六年致香港行東信中，曾抱怨說滬行的庫存本洋不足，以致在拉攏華商方面，怡和不能與其他兩家西商相競爭。<sup>⑩</sup>

道光初年的白銀外流，論者多歸咎於西方的鴉片輸入。此誠不虛，但另一重要因素實和銀元的在沿海廣為流通有關。蓋西班牙銀元既然求過於供，於是就有貼水出現。換言之，其本身的價值往往高於其所含白銀的價值。此一現象在十八世紀末即已普遍，至十九世紀初更是變本加厲。有一種稱為「老頭」(Old Heads) 的本洋 (Carolus IV)，因為在內地特別受歡迎，所以貼水也就特別大，高到一成至三成不等。<sup>⑪</sup> 部分西商為博取其間差額利潤，乃自廣州購買紋銀至加爾各答出售。<sup>⑫</sup> 為阻止此項白銀外流，道光帝曾有諭旨，明令市價不得以銀元為單位；易言之，銀元之流通應僅以其成色及重量為準。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市場上的自然供求律，不是一紙官方命令所能輕易左右的。截止十九世紀中葉，僅在燕湖一地，就有四十萬元本洋在市面流通。<sup>⑬</sup>

就銀元之有貼水一事來看，我們不難了解為什麼在所有的外商之間，廣州的行商對美商特別友好。緣英、美商人在華購茶購絲的價款，來源不同。英商輒先賣鴉片，再購土貨；而美商多先自其本國東部運木材等貨至南美，售得西班牙或墨西哥

⑧ 瓊記洋行檔案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圖書館藏)，Augustine Heard, Jr., "Old China and New," GQ-2, p. 33.

⑨ 楊端六，頁二七二至二七四。

⑩ "Smith Kennedy & Co., Who always pay hard dollars, are difficult people to oppose, and even Gilman Bowman & Co. get the preference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by using dollar doins]." 怡和洋行檔案，Alexander Perceval (Shanghai) to Joseph Jardine (Hong Kong), May 22, 1856.

⑪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London, 1882), pp. 58-59.

⑫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London, 1926-1929), 4 vols., III, 230.

⑬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vol. 36, 1840, p. 180. H. B. Mor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New York, 1921), pp. 164-165.

銀元後，掉舟西航，經太平洋而到廣州，然後以此等銀元購置絲茶。銀元既在沿海廣受歡迎而又有貼水可賺，於是商行遂對美商刮目相看。總商伍秉鑑（浩官，Houqua, 1769-1843）與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行東顧星（John P. Cushing, 1787-1862）及傅波士（John Murray Forbes, 1813-1898）等，尤為友善。<sup>14</sup>

西班牙銀元的廣受歡迎，也可經其兌換率的消長看出。表一列舉了一八五一至一八五五年上海本洋與銅錢比價的變動。由此表可知，在短短的四年半之內，就銀

表 1. 本洋與銅錢比價的變動，上海，1851-1855

日期	本洋一元換銅錢數
1851年 1月 4日	1,320
1851年 5月 9日	1,470
1851年 9月 19日	1,500
1852年 3月 26日	1,520
1852年 5月 14日	1,500
1855年 4月 7日	1,800
1855年 6月 1日	1,859
1855年 6月 27日	1,900

資料來源：「上海研究資料（上海，1936），頁289-291.

元與銅錢的比價而論，銀元的價值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這個現象在外匯匯率方面也反映了出來。以重量及成色而論，本洋一元淨值四先令二辨士，但在一八五二年底，上海的匯率是四先令六辨士到四先令十辨士之間，銀元乃有八厘到一分六厘的貼水。這是無事之秋。遇因戰亂而銀根緊時，貼水更高。例如上海自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之間，因為小刀會之亂及太平軍的威脅，銀元的外匯匯率竟高達六先令到七先令九辨士，也就是有四分四厘至八分六厘的貼水。<sup>15</sup>

十九世紀的五十年代，本洋勢力漸衰。因為第一，西班牙於四十年代初期停鑄此等銀元，因而供應量中絕；第二，中國商民大量私下貯藏，以致流通量更少；第

<sup>14</sup> 浩官致美商英文書札（美國麻省中美貿易博物館藏），Houqua (Canton) to J. P. Cushing (Boston), Dec. 17, 1840.

<sup>15</sup>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and London, 1910-1918), 3 vols., I, 468-469.

三，貼水太高，乏人問津。職此之故，本洋在沿海的標準鑄幣的角色，就漸為墨西哥銀元所取代了。

墨西哥於一八二一年脫離西班牙而獨立，三年後開始自鑄銀元，流入中國後亦稱「鷹洋」。雖然墨西哥銀元的成色（九成）與重量（四百十六克冷）和西班牙銀元相等，但由於發行不久，初不為國人所普遍接受。<sup>①⑥</sup> 但是不久本洋在四十年代開始式微，鷹洋適逢其會，身價漸增。它在一八四二年成為香港的本位貨幣，十年後又為廣州的本位貨幣。其後更逐漸流通於其他沿海地區及內陸，最後卒取西班牙銀元而代之。

墨西哥銀元的市價看好，主要是由於其在內地絲茶產地之廣受歡迎。怡和洋行檔案顯示，在六十年代就有不少內地的絲茶標價是以鷹洋為單位的。<sup>①⑦</sup> 於是通商口岸中從事外貿的中外商人，往往在當地以紋銀購取鷹洋，然後運往內地，用以採購土產。例如廣東商人林欽（Acum）曾於一八六八年三月十日向怡和上海行東蔣森（F. B. Johnson）貸款一萬兩，將所換得的鷹洋，運往安徽購茶。前此數日，另一商人阿禮（Aleet，音譯）也以同樣方式向怡和貸款。<sup>①⑧</sup> 除了絲茶之外，美商也在六十年代用墨西哥銀元在華積極採購棉花，蓋該時美國棉產量由於南北戰爭而大減。

職是之故，每當絲、茶、棉收成之前，總有投機商人在通商口岸預囤鷹洋居奇。這種銀元投機生意，在政治動亂之秋，尤其利害。<sup>①⑨</sup> 八十年代時，鷹洋的流通地區不但包括了南自廣東、福建，北至山東、直隸的廣大沿海地帶，而且也廣及於內地採買制度盛行的絲、茶產區。<sup>②⑩</sup> 就像以前的本洋情形一樣，鷹洋也隨着流通地域的擴大和到處廣受歡迎而有貼水出現。此現象在六十年代後更為顯著，蓋西商同時也用鷹洋在日本購買生絲。<sup>②⑪</sup>

除了本洋和鷹洋之外，其他種類的銀元——例如六十年代的香港銀元、七十年代的日本銀元和八十年代的西貢銀元——也在晚清沿海流通，不過對整個的經濟影響不大。影響較大的是美國銀元（American trade dollar）。美國自從十九世紀中

①⑥ 瓊記洋行檔案，Augustine Heard, Jr., "Old China," p. 33.

①⑦ 怡和洋行檔案，F. B. Johnson (Shanghai) to William Keswick (Hong Kong), July 10, 1869.

①⑧ 蔣森向怡和洋行香港總行報告：I have advanced Acum Tls. 10,000 for the purchase of dollars to be sent into the Moyune Country & he informs me that Aleet's [similar] arrangements are completed for the purchase of Ningchow Congous." 同上，Mar. 10, 1868.

①⑨ 「上海錢莊」頁二六，三九，五九三～五九四。

②⑩ 瓊記洋行檔案，Augustine Heard, Jr., "Old China," p. 33.

②⑪ 怡和洋行檔案，William Keswick (Shanghai) to James Whittall (Hong Kong), Oct. 7, 1864.

葉在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和銀礦後，國內的銀產量增加得很快。爲了和墨西哥銀元在海外競爭，國會於一八七三年授權大量鑄造，其中一部分流入中國市場；但是由於國內政見分歧，乃於一八八七年停鑄。除了銀元本身之外，英國、香港、法國等的銀輔幣，也流行於晚清的沿海一帶。<sup>②</sup>

隨着貿易的擴張和銀元的廣受歡迎，國人也開始自鑄銀元。早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林則徐爲江蘇巡撫時，即鼓鑄銀元，其後臺灣、溫州、天津等地相繼鑄造，但規模都不大，產量有限。最負盛名的當推張之洞於一八八七年在廣州設立的造幣廠，大量鑄造銀元及銀輔幣，極受歡迎。除此之外，民間也流行着國人盜鑄的外國銀幣，自道光中葉至光緒末年，歷久不衰。<sup>③</sup>

銀元不僅在民間廣爲流行，而且終於在清末正式取代了銀兩而成爲全國的本位貨幣。清廷於宣統二年（1910）明令廢止兩爲貨幣單位，而九分成色、庫平七錢二分的銀元，則成爲中國銀本位的新標準。<sup>④</sup>該年的官方財政文件（例如「財政說明書」）中，就用銀元爲記算單位而不用兩。<sup>⑤</sup>次年所編宣統四年的國家預算，也是以銀元爲單位來擬訂的。<sup>⑥</sup>

銀鑄幣既如此重要，現在就讓我們粗略估計一下究竟有多少在晚清流通。官鑄銀幣方面，廣東鑄幣廠自一八八九至一九〇九年間，共鑄銀元一千五百七十八萬餘元；如與五角、二角、一角、五分等的銀輔幣合計，則爲一億五千四百二十一萬餘元。<sup>⑦</sup>再加上其他官鑄銀幣，則總數當在一億五千六百萬元之譜。國人盜鑄的外國銀幣數量，頗不易估計。不過，本洋和鷹洋的貼水既高，造幣私廠的規模又相當大，<sup>⑧</sup>而流通地域也廣達兩廣、兩江等地，則其數量必甚可觀，可能有八千萬兩。我們雖然不知道外國銀元在中國的確實數量，但清政府在一九一〇年的估計是十一億元。<sup>⑨</sup>如果我們假定外國銀輔幣佔其銀元數量的三成，那麼輔幣的價值是三億六千七百萬元。二者合計，則外國銀幣在華流通者約爲十四億六千七百萬元。至此，

<sup>②</sup> King, pp. 114, 179~180, 273~274.

<sup>③</sup> 楊端六，頁二八五~二八六。

<sup>④</sup>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Shanghai, 1879-1910), 11 vols., XI, 341, Circular No. 1701, June 23, 1910.

<sup>⑤</sup> 例如「財政說明書」安徽省，歲入部。

<sup>⑥</sup> 賈士毅，「民國財政史」（臺北，民三九），上册，頁三二。

<sup>⑦</sup> 「廣東財政說明書」，冊七，頁五〇。

<sup>⑧</sup> 有些私家鑄幣廠規模宏大，鑄模購自歐洲，工人有百人以上。詳見 King, p. 224.

<sup>⑨</sup> 楊端六，頁二八〇~二八一。

我們似可初步估定：一九一〇年時，在中國的銀鑄幣總數量約為十七億零三百萬元。（見表二。）

表 2. 在中國的銀鑄幣總數量，1910年（百萬萬洋）

項 目	數 量
中國官鑄銀元	156
中國民間盜鑄外國銀元	80
外國銀元	1,100
外國銀輔幣	367
合 計	1,703

資料來源：「廣東財政說明書」（宣統二年，十六冊冊 7，頁 50。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1962），頁 280-281。餘係作者估計。

既然估出銀鑄幣的總數，我們不妨進而探究銀鑄幣與人口的比率。據可靠的估計，中國人口在一八五〇年時為四億三千萬，一九五三年時為五億八千三百萬，<sup>②</sup>那麼我們假定在一九一〇年時中國有五億人口，當不至離譜太遠。如前所述，當時中國約有銀元十七億元。那麼，人口與銀元在中國的比率為 1:3.4。不過，銀元的使用並不普及全國而只限於沿海諸省及長江中、下游一帶。如果我們假定此等地區的人口佔全國的三分之一，那麼，在這裏的人口與銀鑄幣的比率則為 1:10.2。

### 三 錢莊與銀行的貨幣

第二種新貨幣的形式是錢莊與銀行的貨幣。晚清錢莊的興起，對貨幣供應起了相當的作用。加之莊票普遍為華洋商人所接受，<sup>③</sup>所以錢莊對中國的國內和國外貿易，都有促進的功效。同時，外國銀行和大商家也發行紙幣，流通於沿海一帶。

雖然錢莊歷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sup>④</sup>但錢莊在外貿上發揮其重要的功能不過

②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1959), p. 278.

③ 楊蔭溥，「楊著中國金融論」（上海，民二一），頁二三二。楊端六，頁一四七~一四八。「上海錢莊」，頁一八~一九。

④ 匯票雖早在十七世紀時已使用，但山西票莊的歷史吾人不能追溯至一八〇〇年以前。見 Lien-sheng Yang, *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 A Short History* (Cambridge, Mass., 1952), p. 82. 莊票在十八世紀前半期已在市面流通，而錢莊公會於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時已存在上海。見「上海錢莊」頁三。

是沿海開埠以後的事。例如福州，在四十年代後期，就發展有近百家的大小錢莊，其莊票分制錢、銀元、和紋銀三種，在市面流通。外商爲了要促進生意，所以也漸漸經由買辦的擔保而接受莊票。此事早在一八四六年的上海即已開始，以後隨着該埠錢莊數目的增多而更爲普遍。<sup>③③</sup>在其他商埠（尤其是漢口和天津），情勢也大致雷同。<sup>③④</sup>莊票由於廣受歡迎，很自然地就有貼水的情形出現，<sup>③⑤</sup>不過其程度沒有銀元那麼利害。不僅如此，在戰亂時，由於民間廣泛囤積銀幣，莊票在金融界更是唯我獨尊，操有控制外貿的大權。<sup>③⑥</sup>

莊票不僅在各商埠當地廣泛使用，而且也流通於各商埠之間。貨商如此，西商亦復如此。怡和洋行上海分行早在六十年代就將當地莊票寄往其漢口分行，以備採辦兩湖的茶葉。在七十年代，該洋行的香港總行與上海分行之間，經常以莊票互通有無，以濟眉急。<sup>③⑦</sup>至於華商，更是要依賴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的莊票，來從事沿海與內地之間的貿易。自咸豐末年以降，從事外貨內銷的湘商、川商、滇商等，經常在上海用當地的莊票購買洋貨，再運往內地銷售。同時，從事土貨外銷的華商，也藉通商口岸的莊票之助，在華南購買絲茶，在華北辦置皮革，以便在上海、天津等市場出售，<sup>③⑧</sup>甚或逕自搭貨於外商輪船而直接銷售於歐美。至十九世紀後半期，錢莊在中國的外貿上已成爲不可或缺的金融機構。<sup>③⑨</sup>錢莊和外貿的關係既如此密切，而錢莊東家又想儘量避免國內戰亂的干擾，所以錢莊多設在商埠的租界裏。<sup>④①</sup>

由於錢莊的歷史悠久和外貿的擴張迅速，加之錢莊東家對莊票往往負有無限責任，所以莊票大盛行於十九世紀的沿海。有人估計，在一九一九年時，上海每年發

<sup>③③</sup> Frederick E. Forbes, *Five Years in China, From 1842 to 1847* (London, 1848), p. 68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12, 1858), p. 182.

<sup>③④</sup> *North China Herald* (Oct. 19, 1867), pp. 311, 312.

<sup>③⑤</sup>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Returns, of Trade," vol. 40, 1847, pp. 5-6. Sir Harry Parkes, "An Account of the Paper Currency and Banking System of Fuchowfoo,"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3: 179-190 (1852).

<sup>③⑥</sup> *North China Herald* (May 7, 1853), p. 158.

<sup>③⑦</sup> 怡和洋行檔案, S. I. Gower (Hankow) to Jardine, Matheson & Co. (Shanghai), Apr. 4, 1868. Jardine, Matheson & Co. (Shanghai) to Jardine, Matheson & Co. (Hohk Kong), Jan. 18, 1879.

<sup>③⑧</sup> 張國輝, "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錢莊的買辦化", 「歷史研究」(1963) 第六期頁九二~九七。

<sup>③⑨</sup> 「上海錢莊」, 頁一七七~一七九, 一八四。

<sup>④①</sup> 就我們個人的初步估計, 上海的錢莊在晚清平均有百分之六十六是設在租界裏的。



行的莊票有十七億兩之多。<sup>④①</sup> 如果我們假定上海的莊票發行額約為全國的半數而且莊票的勢力在逐年增加的話，那麼在一九一〇年時全國的莊票每年發行額約為三十億兩。

在晚清沿海的貨幣供應方面，外商的角色相當重要，尤以資本雄厚的西商為然。中西貿易發軔之初，由於尚無現代銀行的設立，洋行往往附帶着經營金融業務，例如存款、放款、匯款、兌換等是。關於這一點，美商何德二世曾說：「在早期與中國貿易時期，每一個西方商號都是其本身的銀行而無須外求」。<sup>④②</sup> 即使在外國銀行設立之後，有些著名洋行仍是氣燄逼人，其所附帶經營的金融業務，有時甚至凌駕了外國銀行的本身業務。<sup>④③</sup> 較負盛名的西商，往往發行其本身的紙幣，在當地流行。怡和洋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六十年代以後，西商的款項多交由其買辦管理；日常的支用，幾全用「辦房支票」(Comprador's order) 方式行之。<sup>④④</sup> 這樣就產生了信用貨幣。

五口通商後，沿海經濟發展迅速，而建立專業性的金融機構之要求也日益顯著，特別是以代人保管貨幣，籌措貨幣的現代銀行為然。對沿海的中外商人來說，如何取得資金上的通融以擴大進出口貿易，尤其是一個切迫的問題。外國銀行就在這種情形之下應運而生。第一家外國銀行於一八四八年上海設立，但不久就為規模龐大的麥加利銀行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 一八五七年設立) 與滙豐銀行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一八六四年在香港成立，一八六五年在上海開始營業) 所超越。其後外國銀行逐漸發展，僅一八六四年一年就有十二家在上海創立。<sup>④⑤</sup> 相形之下，一般洋行的金融業務大為減色。美商瓊記洋行及旗昌洋行 (Russell & Co.) 的檔案資料顯示，在六十年代初期，這兩家洋行的存款人漸將款項提出而轉存入新成立的外國銀行。<sup>④⑥</sup> 雖然旗昌行東金能亨 (Edward Cunningham, 1823-1889) 在一八六二年底將存款的年利由六厘漲到八厘以期與銀行相抗衡，但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洋行在金融業務方面終於不

④① 「上海錢莊」，頁五五一至五五二。

④② 瓊記洋行檔案，Augustine Heard, Jr., "Old China," p. 38.

④③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26, 1873), p. 75.

④④ 參閱 Hao, pp. 72, 259.

④⑤ 瓊記洋行檔案，Augustine Heard, Jr., "Old China," pp. 38-39

④⑥ 瓊記洋行檔案，John Heard, III (Shanghai) to Augustine Heard, Sr. (Boston), May 12, 1862 EM-7. 旗昌洋行檔案 (哈佛大學商學院圖書館藏)，Case 1.

能挽回其江河日下的頹勢。<sup>47</sup>這一趨勢在第一家中國銀行於一八九七年創設後尤為顯著。一般人向此等中外銀行存入活期存款而以後不時以支票的方式加以支取，這樣就產生了「存款貨幣」。不過由於當時使用支票尚未普遍，所以數量不大。

外國銀行勢力雄厚的原因，大要有三。第一、行東多先在外國募得雄厚資金，然後再來華設行。第二、資本既然雄厚，聲望因而愈隆，於是中外人士爭相存款。第三、外國銀行發行紙幣，至沿海流通。此等鈔票的流通地區最初只限於香港和上海，但七十年代末已延至閩廣和兩江，八十年代時更擴及長江中游的商埠。<sup>48</sup>就中國沿海的貨幣制度來說，外國在華銀行所發行的紙幣至清末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雖然外國銀行發行鈔票時要有金銀作為其準備金，不過由於此等銀行實行部分準備制度 (fractional reserve system)，於是紙幣的發行不但加強了外國銀行本身的貸款能力，而且也增加了貨幣在中國的供應量。

有些外國銀行的紙幣在中國流通，同時也在外國流通，但此等銀行只有籠統的報告，而沒有將中國部分作個案處理。於是外國銀行所發行的紙幣究竟有多少在中國流通，是頗不容易估計得正確的。以一九一〇年來說，低的估計是三千五百四十萬元，高的估計是一億元，<sup>49</sup>而我個人則認為約有六千八百萬元。同時如前所述，有些大洋行也發行紙幣，二者合計，我們可以說，在宣統年間洋行和外國銀行所發行的「紙幣」約有七千五百萬元。

#### 四 鴉片的貨幣功能

第三種新貨幣的形式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鴉片。鴉片之於中國，無論在經濟上、社會上、和道德上，都是為害極大的。這一鐵的事實是不容掩飾的，也是大家所能詳道的。不過在述及鴉片對中國的全面影響時，鴉片的貨幣角色，至今尚鮮有人詳論。英美洋行的一些檔案顯示，鴉片在晚清除了為人吸食之外，無論在沿海和內地，它也同時廣泛地被用為支付的手段 (means of payment) 和交換的媒介 (medium of exchange)。就此一意義而論，鴉片不可否認地具有貨幣的功能。

<sup>47</sup> Stephen C. Lockwood, *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 1858-1862: American Merchant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1), p. 108.

<sup>48</sup>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832-1891* (Shanghai, 1892), p. 177.

<sup>49</sup> 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Cambridge, Mass., 1965), p. 58.

鴉片之具有貨幣功能，主要是由於社會上對它有持久而廣泛的需求。中國固有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使得外商很難推銷其布匹等舶來品，但唯獨鴉片是個例外。一個在香港供職的英國官員，在他一八五二年寫給英國外務部的報告中說：

「我們沒有帶給中國人他們所喜歡的東西。……只有鴉片才能打動他們的鐵石心腸。」<sup>④</sup> 其中原因，除了吸食一項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對於某些旅行的人來說，攜帶鴉片最為適宜。晚清的許多謀殺案件顯示，不少旅行者由於所攜帶的紋銀行李過重而為歹徒（包括船伙與轎夫等）所識破，卒至在旅途中為人暗下毒手而殞命。就單位重量而言，鴉片的價值誠然不能和白銀相提並論；不過它遠較制錢為貴，而又能任意分散在行李之中以躲過謀財害命者的注意，因此大受一般旅客的歡迎。甚至各地赴京趕考的學子，也往往攜帶鴉片以支付一路上的食宿所需。<sup>⑤</sup>

早在一八五〇年左右，香港的商人、工人、和手工業者就用鴉片為主要的支付手段之一。例如香港的零售商人，多係來自廣州，其資金泰半貸自本鄉。他們經商贏利後，就運鴉片回鄉以償債務。<sup>⑥</sup> 在類似情況之下，瓊記洋行行東也將商埠與商埠之間的鴉片運輸，完全當做貨幣的滙兌來看。<sup>⑦</sup> 怡和檔案顯示，不僅鴉片本身可以充為貨幣，鴉片的訂單有時也當鈔票來使用。<sup>⑧</sup>

至於外貿方面，鴉片在通商口岸裏普遍地被用為交換的媒介。銀根緊時，外貿商品的市面難免因而萎縮，但是存有大量鴉片的外商如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Dent, Beale & Co.)等，卻仍能以鴉片順利地購得絲、茶。怡和洋行福州分行在其大班賴肯(Thomas Larken)和費雪(V. W. Fisher)主持之下，早在一八五五年就經常以鴉片來購置福州市面上的武夷茶；<sup>⑨</sup> 五年後，新任大班麥克里德(M. H. Macleod)接手，積極籌畫，更擴大了這種貿易方式。<sup>⑩</sup> 同時，怡和也在上海以鴉

④ W. H. Mitchell to Sir George Bonham, Hong Kong, Mar. 15, 1852, British Foreign Offic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China, FO 405/2, p. 410. 原文為：“We bring the Chinese nothing that is really popular among them…… Opium is the only ‘open sesame’ to their stony hearts.”

⑤ Jonathan Spence, “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 in Frederic E.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lif., 1975), p. 168.

⑥ Memorandum by W. H. Mitchell, Nov. 1, 1850, FO 17/183.

⑦ 瓊記洋行檔案, John Heard to Augustine Heard, Sr., Apr. 12, 1858, EM-1.

⑧ 怡和洋行檔案, A. G. Dallas (Shanghai) to David Jardine (Hong Kong), Jan. 13, 1852.

⑨ 同上, Thomas Larken (Foochow) to Joseph Jardine (Hong Kong), Aug. 29, 1856.

⑩ 同上, M. A. Macleod (Foochow) to Alexander Perceval (Hong Kong), May 11, 1861.

片購買生絲。甚至在銀根緊時，鴉片往往成爲外商獨一無二的購買茶葉和生絲的付款方式。<sup>57</sup> 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些中國的茶商和絲商就不由自主地收受鴉片而兼爲鴉片商了。

內地商業方面，也不例外。外商的活動範圍雖然多限於通商口岸，但是他們經常派遣買辦和其他採辦代理人往內地購買土產。在這種「內地採買制度」之下，無論洋行墊款或貸款，其方式多半以銀元及鴉片行之。以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的上海爲例，怡和洋行就經常以鴉片爲貸款，交付寧波絲商楊坊 (Takee) 和廣東茶商又隆 (Yowloong)。寶順洋行也以同樣方式向廣東茶商柯紀 (Coekeye, 音譯) 訂貨。旗昌洋行和瓊記洋行等也間或有之。<sup>58</sup> 這些以鴉片爲貸款的數量，往往都相當的大，尤其是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爲然。例如一八六三年四月初，怡和貸給又隆兄弟一批鴉片以便往茶區購茶。我們雖然不知道這批鴉片究竟有多少，不過從它能夠短時刺激內地茶價上漲一事來看，其數量必甚可觀。<sup>59</sup>

福州是購買武夷茶的中心。從一八五四年開始，由於太平軍及小刀會的動亂，上海外貿逐漸萎縮，於是由福州輸出的茶葉量就大幅增加。其後二十年左右，怡和福州分號大量購茶，直運歐美，而其購茶的方式，則係經常以鴉片貸給其買辦阿喜 (Ahee) 和廣東茶號泰勝 (Taising)、永泰 (Yuntai)、同興 (Tonghing, 皆音譯) 等。阿喜在一八五五年爲怡和購得價值四十四萬餘元的茶葉，其款項係以銀元及鴉片的方式，貸自怡和。次年五月，怡和以相當數量的鴉片貸給茶商阿韋 (Awy, 音譯)，阿韋不久又將其中一部分 (約值一萬元) 轉貸給江西的一個小茶商。<sup>60</sup>

鴉片的貨幣功能，很明顯地表現在所謂「蘇州制度」(Soochow system) 上。當上海初開埠之際，西商乃就地在城內向華商購買生絲，價錢談妥後，有時以鴉片折價交付。後來爲了減低成本，擴大貿易，彼等乃派遣華商代理人攜帶鴉片直接往生絲產地的蘇州，作爲購置生絲的付款方式。不久，其他中國絲商起而效之，先向在滬西商借得鴉片，然後運往蘇州買絲。此種貿易方式行之既久，遂漸成爲一種常軌。這就是當時西商所稱的「蘇州制度」。

<sup>57</sup> 同上，A. G. Dallas (Shanghai) to David Jardine (Hong Kong), Dec. 18, 1851

<sup>58</sup> 同上，May 3, 1851; James Whittall (Shanghai) to David Jardine (Hong Kong), Apr. 9, 1863.

<sup>59</sup> 同上，James Whittall (Shanghai) to Alexander Perceval (Hong Kong), Apr. 9, 1863.

<sup>60</sup> 同上，George V. W. Fisher (Foochow) to Joseph Jardine (Hong Kong), May 1 and 4, 1856.

「蘇州制度」由粵商徐榮村 (Yungkee, 徐潤之叔) 和寶順洋行合作, 首開其端。<sup>①</sup> 怡和洋行上海經理戴勒斯 (A. D. Dallas) 急起直追, 於一八五一年四月和旅滬寧波大絲商楊坊合作, 進行此種貿易。楊坊最初只是經紀人, 而一切風險由怡和承擔; 後來事實證明風險很小, 於是不久楊就改為獨立的絲商兼鴉片商了。<sup>②</sup> 初, 上海開埠後數年, 楊坊即以經營生絲, 頗負盛譽; 但不久生意虧折, 潦倒滬上。當一八五〇年初怡和邀楊共同從事滬蘇間貿易時, 楊意猶未決; 但一年之後, 楊澈底認清了鴉片在貿易上的重要性, 蓋每屆絲茶盛季, 外商所存銀元有限, 必須以鴉片來折付部分絲價和茶價。換言之, 華商之經營絲業者往往必須同時附帶販賣鴉片。日久習以為常, 在上海的中國絲商便很自然的接受外商鴉片為折付絲價的方式而根本不曾想到要求外商以現款支付了。<sup>③</sup> 於是楊坊在怡和的一再邀約之下, 遂決意嘗試「蘇州制度」式的貿易, 卒至漸漸恢復其昔日在商界的聲譽。<sup>④</sup> 除怡和之外, 其他西商如旗昌洋行等也都從事此種貿易。<sup>⑤</sup> 但規模最大的當推在華西商之佼佼者的英商寶順洋行。該行在一八五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五月二十日的短短的一個月裏, 就將價值約為二十萬元的鴉片由滬運蘇, 以折價購買生絲。<sup>⑥</sup> 由楊坊重振舊業的歷程和鴉片的大量使用, 我們就不難了解鴉片的貨幣功能之重要性。

更有進者, 當時除鴉片之外, 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商品可以普遍地用來當做支付的手段或交換的媒介。例如怡和洋行的上海分行和福州分行, 在五十年代時, 間或有鴉片缺貨的現象。當時無論其大班如何的努力想要用洋布來代替鴉片以購絲茶, 結果都歸於失敗。原因之一是布匹太笨重, 不便運輸, 尤以在產茶的崎嶇山地為然。其次, 布匹在內陸的需求量極少; 甚至在「蘇州制度」鼎盛時期的五十年代, 以富庶著稱的蘇州, 也不例外。<sup>⑦</sup> 因此, 洋布不能代替鴉片來扮演貨幣的角色。

表三顯示, 每年由印度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增加得很快。由十九世紀初期的四百六十萬元遞升到三十年代的一千三百二十萬元; 在南京條約後的二十餘年內, 更

① 徐潤, 「徐愚齋自敘年譜」(民十六), 頁四, 十八。徐潤等編, 「廣東香山徐氏宗譜」(光緒八年), 冊七, 頁六四。怡和洋行檔案, A. G. Dallas (Shanghai) to David Jardine (Hong Koug), May 20, 1851.

② 怡和洋行檔案, A. G. Dallas (Shanghai) to David Jardine (Hong Kong), May 3, 1851.

③ 同上,

④ 同上, Apr. 4, 1851 and Jan. 22, 1852.

⑤ 同上, May 3, 1851.

⑥ 同上, May 20, 1851.

⑦ 同上, May 16, 1851.

由一千八百萬元增到三千五百萬元。<sup>69</sup> 八十年代時則為三千四百萬元。同時，中國自產的鴉片數量在七十年代時就漸增多，到八十年代時更盛。如果我們假定當時國產鴉片量為輸入量的一半，則其價值約為一千七百萬元。總之，在光緒中葉以前，中國每年損耗鴉片的價值快速地增加。自十九世紀初期的不及五百萬元增加到八十年代的五千餘萬元。換言之，在七十年之內，增加了十一倍之多。誠然，這些鴉片並非全部都盡了貨幣的功能；不過，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無疑地在吸食之前曾經多次地被當作貨幣來使用——被用為支付的手段或交換的媒介。

表 3. 鴉片在中國的每年消耗價值，1810's—1880's (百萬鷹洋)

年 代	輸 入	國 產	總 值
1810's	4.6	0	4.6
1820's	9.7	0	9.7
1830's	13.2	0	13.2
1840's	18.0	0	18.0
1850's	30.0	3.0	33.0
1860's	35.0	8.0	43.0
1870's	36.0	13.0	49.0
1880's	34.0	17.0	51.0

資料來源：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Cambridge, Mass., 1964), p.233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Shanghai and London, 1910-1918), 3vols., I, 556. 其他係作者之估計及計算。

## 五 結 語

晚清沿海貨幣的供給量隨着銀鑄幣的使用，銀行的貨幣發行，和鴉片的流通而大量增加。對於這三種新興的貨幣，我們進行了初步的估計。如表四所示，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約有十七億元的銀鑄幣，而錢莊和銀行每年所發行的紙幣額為三十億元。同時，鴉片的每年損耗量是五千萬元左右，而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具有貨幣的功能。這些數字有什麼意義呢？我們不妨和其他有關數字作一比較。海關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平均每年輸出值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為一億零七百萬元

<sup>69</sup>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556.

(七千七百萬兩)，九十年代為一億八千五百萬元（一億三千三百萬兩）。<sup>⑥</sup>至於清政府的歲入則更少；據估說，在九十年代初期僅為一億二千四百萬元（八千九百萬兩），二十世紀前數年也不過一億四千三百萬元（一億零三百萬兩）。<sup>⑦</sup>相形之下，晚清沿海新貨幣的數量就顯得格外龐大而意義深長了。

表 4. 晚清新貨幣數量，1880's-1910（百萬鷹洋）

	鴉片a		銀鑄幣b		銀行紙幣c	
	數量	%	數量	%		
中國	17	33	236	14	3,000	98
外國	34	67	1,467	86	75	2
合計	51		1,703		3,075	

資料來源：前表2. 表3.

- a.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每年消耗價值。
- b. 一九〇五年時在中國的總量。
- c. 一九一〇年時莊票與外國銀行紙幣每年發行額。

就近代中國經濟發展而論，這一龐大的貨幣供應量不但擴大了中外貿易，刺激了沿海商業，而且對於內陸的商業活動也有促進的功效。換言之，它加速了近代中國經濟的商業化。從某一角度看，這種商業發展當然助長了經濟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從另一角度看，雖然貨幣的大量供應往往會引起通貨膨脹，<sup>⑧</sup>但是衡諸實際情勢，中國傳統的以紋銀和制錢為本位的貨幣制度，實難以應付近代商業上的需求。我們可以說，沒有這三種新的貨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就不會有那麼利害。我們也可以說，沒有這三種新的貨幣，就沒有晚清沿海的商業大擴展。

除商業之外，晚清沿海新貨幣對中國的工業化也有影響。在資本方面，大部分的早期工業資本是仰賴於商業資本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有不少沿海商人將所累積的商業資本轉而投資於各種工業。廣州商人對近代輪船、開礦、紡織、鐵路、機器製造等方面的投資，就是很好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無論和傳統中國來比較，或者和近代中國的內地來比較，晚清沿

<sup>⑥</sup> 由 Chi-ming Hou, pp. 231-232 計算得來。

<sup>⑦</sup>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65), pp. 326-327.

<sup>⑧</sup> 參閱全漢昇，「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民四六），第二十八本。

海的利率都低得驚人。此中原因固然複雜（有經濟性的，也有政治性的），但是沿海這三種新貨幣的使用，無疑地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本來，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就會直接使銀根鬆弛而貸款容易；何況此等新貨幣的使用也間接促進了商業證券（instrument of credit）的日臻完備，進而使得沿海的工商界人士更容易獲得信用貸款。貨幣供應量的增加與信用貸款的容易取得，終於導致了沿海的低利率。在傳統中國，年利一般都由四分到一倍餘不等，而近代中國內地的利率也在四分到八分之間。相較之下，晚清沿海的一分二厘的低利率，就顯得格外不尋常。此一低利率積極地幫助了沿海的商業和工業的擴展。更有進者，就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的理論觀之，<sup>②</sup> 在晚清由於並非所有的資源與人員已經充分就業，於是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和低利率的普遍，就對中國近代的整個經濟發展，影響更大。

---

<sup>②</sup> 關於就業，利息與貨幣，參閱凱因斯名著，*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1936).